

# 论中国经济结构 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

毕先萍 简新华

**摘要:** 本文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迁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我国经济转型期经济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指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在改革和发展中结构性反差的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由于存在政策性障碍,并未建立起正常、有效的传导机制。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并使之逐步缩小,必须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消除所有制、产业、城乡等结构变迁中的结构性反差问题。

**关键词:** 经济结构变动 收入分配差距 结构性反差

## 一、问题的提出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决定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水平上怎样发生相应的变化,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趋势如何变动,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迄今为止相当有影响的是库兹涅茨(Simen Kuznets)(1955)的“倒U理论”(即低收入水平的农业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收入差距先是逐步扩大,当达到一定阶段后,开始下降)。后人纷纷以此为起点,从各种角度试图予以证明或证伪。由于对倒U型假设的很多表述都过于简单,使人容易误解为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分析。事实上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革。阿德尔曼(Adelman, I.)和莫里斯(Morris, C. T.)(1973)指出:“……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增长水平或增长率,是决定收入分配形式的基本因素。”因此,对结构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显然,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的结构特征会不一样,阿德尔曼(Adelman, I.)和莫里斯(Morris, C. T.)(1976)的研究还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是6个能较好地解释收入不平等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构造了包含35个反映经济、社会、政治影响的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平均看来,最贫穷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变动与社会经济的二元化程度负相关,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和中高等教育规模正相关;最富裕的5%的人口的收入份额变动与资源丰裕程度正相关,与政府的干预、公共部门比重、政府投资的比值负相关;处于中等水平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变动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有规则的联系,但也并非线性相关。莱文尼(Ravallion, M.)和陈少华(S, Chen)(1997)通过对东欧和中亚经济转型国家1981-199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转型经济中,由于实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我国学者的研究(赵人伟、李实等,1999)也表明,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累积的种

种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及其在改革、发展中的演变,即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拟以此假设为出发点,从实证角度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辨析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各自影响程度的大小,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

## 二、经济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1. 指标及数据解释

#### (1) 收入分配差距指标

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本文选择了基尼系数来表示,其中1980-1993年数据见莱文尼(Ravallion, M.)和陈少华(S, Chen)(1997),1994年及以后数据见陈少华(S, Chen)和王彦(Y, Wang)(2001)。由图1可以看出:(1)基尼系数总体趋势一直在上升,表明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恶化,从1980年的0.32上升到1999年的0.4164,幅度达30.13%。(2)基尼系数变动具有阶段性特点,从1984年来一直稳步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1990-1994年间迅猛增加,1994年达到顶点(0.4334),此后在1995-1997年略有下降,1998年后又开始回升。

#### (2) 经济结构指标

国际经济学界对二元经济差别的考察通常采用二元反差指数,鉴于我国正处于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为综合体现结构变迁特性,因此用经济结构反差指数代替简单的产值结构数据。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产业、城乡、地区和所有制结构等,因此我们选取这四个指标进行分析,将反差指数从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经济领域引申至三次产业、所有制、城乡和地区结构上,从而构造出产业结构反差指数(即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与其产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的平均数)、所有制结构反差指数(即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各自就业和产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的平均数)、城乡结构反差指数和地区结构反差指数。具体数据参见图1和表1(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其中各所有制部门产值数据引用工业总产值构成中的数据)。

表1 基尼系数和经济结构各反差指数

年份	基尼系数	产业反差指数	所有制反差指数	城乡反差指数	地区反差指数
1980	0.3200	0.2573	0.0597	0.4506	-
1981	-	0.2420	0.0476	0.4293	0.0934
1982	0.2880	0.2320	-	0.4150	0.0917
1983	0.2720	0.2273	0.0357	0.4166	0.0875
1984	0.2570	0.2133	0.0043	0.4262	0.0900
1985	0.3140	0.2267	0.0379	0.4597	0.0895
1986	0.3330	0.2253	0.0614	0.4699	0.0943
1987	0.3430	0.2213	0.0870	0.4710	0.0997
1988	0.3490	0.2247	0.1188	0.4808	0.0944
1989	0.3600	0.2333	0.1255	0.4899	0.0947
1990	0.3484	0.2200	0.1382	0.3345	0.0750
1991	0.3620	0.2347	0.1210	0.3559	0.0831
1992	0.3898	0.2447	0.1677	0.3509	0.0901
1993	0.4196	0.2433	0.2093	0.3051	0.1077
1994	0.4334	0.2273	0.2907	0.2900	0.1092
1995	0.4151	0.2113	0.3255	0.2643	0.1150
1996	0.3980	0.2007	0.2998	0.2481	0.0664
1997	0.3979	0.2053	0.3337	0.2403	0.0734
1998	0.4030	0.2080	0.2902	0.2355	0.0749
1999	0.4164	0.2160	0.2390	0.2120	0.0783

注: 以上数据除基尼系数外均来源于 1980-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和 1993-2000 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并经整理和计算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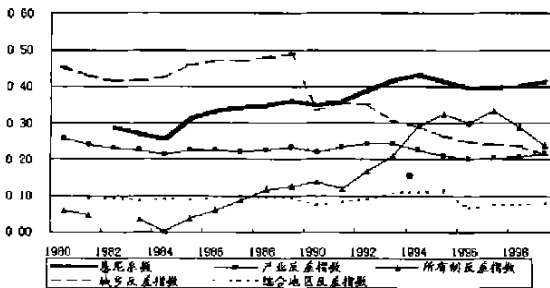


图1 基尼系数和经济结构各反差指数变动情况

从图1来看,变动最剧烈的是城乡和所有制结构反差指数,均以1991-1992年为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城乡结构反差程度自1992年后急剧减缓(要解释一点,城乡结构指数在1989-1990年出现急剧下降,主要是1990年前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数据缺失造成的,但由于1990年前乡镇企业发展较少,所以一般说来对整个数据的影响不大),而所有制反差指数则在1992年后直线上升,经过短期震荡,于1997年后回落。相比之下,产业反差指数和地区反差指数变动较平稳,处于缓慢下降趋势,后者幅度更小些。

### 2. 分析结果

拟用上述数据进行线形回归分析,以判断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反差程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否有影响作用,如果有,则各因素影响程度分别有多大。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结构变动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调整后的  $R^2$  达到 0.889, 即经济结构的变迁可以较好地解释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现象。

(2) 所有制反差指数和产业反差指数显著进入回归模型,其显著性系数分别为 0.000 和 0.003。说明所有制结构变

动对基尼系数变动有非常强烈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基尼系数变动有影响。从回归系数看,两个指标与基尼系数均呈同向变动趋势,即结构反差程度增强会导致基尼系数上升,反之则反是;影响基尼系数变动最大的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反差指数,该指标每变动 1%, 会引致基尼系数同向变动幅度达 1.097%。

(3) 城乡和地区反差指数未显著进入回归模型,即相比之下,这两个结构的反差程度变动对基尼系数变动没有明显影响。这与目前经济学界将之视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两个很重要因素的普遍观点似乎不符。

表2 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Sig
产业反差指数	0.388 ***	0.003
所有制反差指数	1.097 ****	0.000
城乡反差指数	0.052	0.778
地区反差指数	-0.006	0.958
调整后的 $R^2$	0.889	

## 三、经济结构变迁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

### (一) 经济转型期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引致收入分配差距变动

1. 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会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失业率的变化,从而直接引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家查德哈(Bankim Chadha)和柯里斯(Fabrizio Corice - Ili)(1997)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流动。转型初期,国有经济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很高,而非国有经济比重很低,总失业率也很低;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国有经济占总人口就业比重迅速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开始上升,但后者还无法吸纳从国有经济中分离出来的全部失业人口,因而公开失业人口激增,总失业率明显上升;随着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吸纳国有经济失业人口的能力不断扩大,总失业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失业、下岗情况较严重,且一段时期内还有加速趋势。据测算,2000年中国城镇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总共约700~900万个,而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实际供给过剩高达1100~1300万人。2000年1-6月,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加上全部下岗职工中没有就业的人员为1120万人。全国不在岗职工的人数仍然呈上升趋势,至2000年9月底达到2173.1万人,同比增长6.6%。从我国和各转型国家情况看,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就业与否直接决定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失业、下岗人数激增必然引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2. 在经济转型期,改革带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非国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意味着资产所有权的变化及与之相关的资产收益权的变化,从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变动。这方面最早的论述源于斯密和马克思的关于传统部门维持生计收入的假设,关于资本侵占劳动的思想等,即在私有经济中,主要生产要素(资本)在个人或家庭中的分配决定了收入的分配。费里亚(Francisco H. G. Ferreira)(1997)通过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FSU)在转型中变化的观察,证实了以上观点。

从我国来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国有、集体、私营以及三资平分天下的局面,这种局面之所以引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1)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产权性质不同,其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明显有异。非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明确,其经济效益和增长率较国有经济为高。国家统计局工交司课题组最近的报告指出,2000年底,国有工业亏损面为32.4%,比非国有企业高出13.8个百分点。姚洋(1998)从1995年工业普查中随机抽取了14670个各类企业,对这些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与国营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致使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迅速下降,反映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1979年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79%,到1999年急剧下降至28%左右。(2)国企改革进展仍较为缓慢,制度创新、体制转换滞后。国有企业解雇冗员的权力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和影响,造成国有企业就业比重下降速度远低于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冗员情况严重。最新调查显示,70%的国企面临劳动力过剩问题,过剩的劳动力约占企业劳动力总数的25%。(3)目前非国有经济吸收就业的能力正在弱化,主要原因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各种政策的限制,如投资领域的限制。2001年年初由亚洲开发银行组织了一次对我国民营经济的研究,结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我国31个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民营经济所雇用的人数占总就业人口中的比率来看,这两者有密切的相关度(相关系数为0.9074),民营经济雇用人数的比率越高,经济就越发达。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经济成分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变动之间不尽一致,所有制结构的反差指数不断扩大。1980年该指标为5.97%,到1997年骤升至33.37%,之后由于实行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措施,企业冗员情况得到一定缓解,结构反差程度也有所缓解,但1999年仍为23.9%。从而影响了企业职工收入的提高,公开失业率激增,大量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收入状况明显恶化,从而造成体制内外的收入差距。另外,教育和技能收益的增加,也导致不同知识阶层收入差距扩大。

(二)经济后起国家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由于存在异于先行发达国家的特征,致使产业间,尤其是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变动存在严重反差,致使产业间收入差距相应发生变动

经济后起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存在异于发达国家的特征,结构转换摩擦较发达国家大。和先行国的产业结构转换是在结构关系较平衡基础上进行的不同,后起国的产业结构转换格局具有很大的倾斜性:在农业与工业中,工业倾斜发展;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中,重工业倾斜发展;在基础工业与加工业中,加工业倾斜发展。这种倾斜的结构转换态势,有利于加速结构转换过程,但却往往是建立在结构关系不平衡基础上的,从而结构转换的摩擦较大。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这种结构转换的倾斜度,就可能造成产业结构关系不协调,几大产业不相适应。

因此在产业结构变动质量上体现为结构反差的存在:在

先行发达国家的成长过程中,产值和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与服务业的转换基本上是同步的,即随着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农业劳动力也相应地向工业与服务业转移,两者转移幅度的差异不大,因而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各部门之间在生产率和收益上趋于均等化。但在后起国家,特别是当代发展中国家中,产值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这种状况反映了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差异。一般说来,先行国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接近于1;而在后起国,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在2以上<sup>10</sup>。后起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增长进程在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变动上的不同步,使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已有的差别更扩大了。由此必然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重工业发展和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它们在GDP和就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均偏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得到纠偏,第二、三产业实现了弥补性发展,产值比重迅速上升。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一般规律十分接近。从收入结构看,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并居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第三产业比重也稳步上升,并于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大支柱,第一产业比重则持续下降,接近现代化水平的临界点(15%)。但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从就业结构上看,尽管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已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6.9%,第二产业稳中略升,第三产业持续稳定提高,但1999年第一产业的结构反差指数仍为32.4%。由于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和报酬不同,而农业发展、收入增长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从而导致农业和二、三产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三)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关于城乡差距形成原因的解釋,一般的经济学解释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即城镇与农村两部门生产率水平的极大差距决定着城乡收入的差距,城乡生产率差别的缩小必然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然而从上面实证分析看,却发现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城乡结构反差程度在1980-1999年间的下降幅度最大,即城乡生产率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二者间的收入差距却没有同比例变动,即这种结构的改善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获益,没有减少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轨迹,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波浪式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高达2.37:1。1978年后,农村经济的率先改革,使农民率先获益,从而使我国历史上居高不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迅速缩小,到198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例缩小到1.70:1。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扩大趋势,到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54:1,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差距水平,1999年继续扩大到2.65:1。

## 四、结论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并没有否定城乡结构变动对收入差距有影响这个经济学常理,恰恰相反,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一系列政策性障碍和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使得城乡结构变化与收入差距变化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不能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事实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没有农村改革成功,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导致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而占用经济资源多,最终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4年,全国经济增长中农村的贡献占3/4,但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却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因为,仅1994年城市就从农村中抽走了1340多亿元的资金<sup>11</sup>。(2)防止或限制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城乡隔离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就业格局,限制移民政策阻碍了农民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向城市迁移,而这种移民从长期看将会降低城市的工资水平,提高农村农业和非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从目前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看,农村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滞后,管理职能界定混乱,致使乱摊派现象屡禁不止,农民税负沉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快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等等,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4)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基础性事业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

关于地区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威廉姆森(Williamson, J. G.)(1965)提出了地区收入的倒U型理论,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慢慢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就基本保持一个平衡阶段,然后就下降。他提出这个理论也用了地区的二元结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总有一些地区相对落后,一些地区相对发达。如果将此同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对照一下,那么可以说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就是传统部门相对集中的地区,而那些相对发达的地区就是现代部门集中的地区。当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的时候,地区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因此,地区结构其实是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及城乡结构在不同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综合体现。在我国,地区差距问题首先是城乡差距问题,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问题;其次是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根据各省市产业结构综合分析,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均在四成以上。我们上述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不对应。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等选取了各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运用基尼系数、差异系数等统计指标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sup>12</sup>这个现象同样揭示了一点,即由于各地区现行体制、政策措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东中西部地区及其内部结构变化与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传递机制在发育程度上存在差异,中部和西部相比东部而言,传导机制还未真正发挥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我国在集中精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时,应该以此为出发点,相机制定对策。因此,我们认为,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必须统筹考虑,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减少城乡、所有制和产业结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反差,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难题。第一,深化所有制改革,为各种经济成分充分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消除体制结构反差引致的差距扩大因素;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消除收入差距产生的产业结构性因素;第三,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消除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体制障碍,合理引导并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结构,使城乡经济结构的改善与收入差距的缩小之间形成正确、有效的传递机制,避免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局面的再现。

### 注释:

Adelman, I. and Morris, C. T., 1973.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delman, I. and Morris, C. T., 1976. *Policies for Equitable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1976.

Ravallion, M., and S. Chen, 1997. *What Can New Survey Data Tell Us about Recent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 (2), 1997: 357 ~ 82.

S. Chen, and Yan Wang, 2001. *China's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Trends between 1990-1999*,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 2651, World Bank.

二元反差指数:是部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反差指数在理论上的最小值是0,即当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时,指数就变为0,部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相等。显然,二元反差指数越大,表明反差程度越大。参见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25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的结果”(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文版,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Francisco H. G. Ferreira, 1997.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and Wealth*,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08, World Bank.

姚洋:《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总第58期。

在我国的投资领域中,国有经济可以进入的有80个,外资可以进入的有60个,而非国有经济可以进入的只有30个。非国有经济投资受到限制的领域,主要在第三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而这些部门大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

10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3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见《1995年经济绿皮书》。

12《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结果——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8年第2期(总第23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N)